揭开黔西北150年前的历史尘埃



烽火非亲抻

陈绍举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燧火非亲地

陈绍举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韭菜坪 / 陈绍举著.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2-2328-0

Ⅰ. ①烽… Ⅱ. ①陈…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4892 号

烽火韭菜坪
陈绍举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 版 地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大楼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12-2328-0
定　　价　35.00 元

自　序

《烽火韭菜坪》一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贵州乃至全国苗族历史研究的一大成果，也是贵州乃至全国民族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真实地反映了贵州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阶级矛盾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斗争的内在原因，再现了贵州黔西北苗族领袖陶新春组织以苗族群众为主的民族起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斗争过程，展示了各族人民在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农民起义是私有制下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在私有制社会制度下，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必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不可避免地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私欲的不断膨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无止境，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也就越演越烈。当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人民群众就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封建统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其中农民起义是人民群众有组织地向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最有效的形式。

由于农民运动参加的人数多，活动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影响极其深远，触动了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因而必然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由于地方官府没有能力尽快解决这种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导致了清朝皇权在这么大范围内一时威风扫地。这样的农民运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全国性的农民运动水涨船高，民族起义运动就会层出不穷。如果农民领袖中出现了能代表时代潮流，视野开阔，组织能力强的领导者来推动农民运动，清朝政权崩溃的时日也就不远了。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镇压民族起义运动。

清朝统治者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官吏、地主、恶霸沆瀣一气，奸淫民意，恣意压制杀戮弱小群体，以致造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情况。震惊朝廷的轰轰烈烈的黔西北苗族大起义就是清朝统治者违背民意，“官逼民反”的结果。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损害人民尊严和生存权利，正是它走向灭亡的历史根源。由于历史局限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作为封建专制的清朝，既不能消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摆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必然命运。没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就不会出现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任何形式的“安抚”“以夷治夷”甚至剿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行不通的。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农民大起义，以及清朝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就足以说明这个铁一般的道理。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阶级本性，致使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民族问题陷入了起义、镇压、再起义、再镇压的深渊，摆不脱“三年一小反，十年一大乱”循环

模式。贵州清朝咸丰和同治年间的各民族大起义，就是这种循环模式的再现。黔西北苗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英勇斗争，就是这种循环模式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环节的相互衔接，构成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链条，形成清朝统治阶级走向灭亡的历史潮流。

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从侧面反映了在腐败和黑暗的社会制度下，苗族人民已经觉醒。起义前夕，组织者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唤醒了各族群众特别是苗族群众的阶级觉悟。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用仙姑出面唤醒群众，反映了起义的组织者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希望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心态，找准了发动起义的切入点。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苗族妇女在政治上的觉醒，苗族女性同样可以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角色，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为民族生存和发展而斗争。

人类的发展历史证明，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培育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长期坚持与剥削阶级作斗争。战争是残酷的，但它同时又是最能锻炼民族性格和民族独立意识的熔炉。陶新春在领导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培育出了苗族同胞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以及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民族反抗意识，并在斗争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充分说明在战争的大熔炉中，不少人的性格得到了塑造和提升，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许多参加起义的勇士，在敌人的面前显示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让人另眼相看和敬畏，展现了强悍的民族个性。黔西北苗族起义军的主要成员，有的在战场上牺牲，有的在被俘之后英勇就义，从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一种高贵的民族气节。

世界上不管是任何民族，其历史之所以悠久，关键在于他有自己敢于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民族英雄，有敢于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精神。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之下，苗族群众没有生存的空间，靠给地主当帮工换取饭吃，稍不注意还被剥夺生命。陶新春从小寄人篱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作为苗族起义的主要领袖，领导穷苦百姓进行起义，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官吏、恶霸和地主的反动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走投无路的社会环境下，苗族人民只能揭竿而起，用民族的鲜血来铸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得到了太平军有力支持。以石达开为代表的太平军在深入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部时，与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亲密合作。太平军和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共同打击了贵州的地方官府，包围毕节县城；太平军帮助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制造先进的武器，帮助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建立军事制度，为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培训指挥人员；石达开部属还按照太平军建制，赐封陶新春的最高指挥官衔，赐封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其他高级将领的官衔。这些都足以说明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已经与太平军融合，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黔西北苗族起义运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伸。

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得到了周边友军的有力支持。在清朝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广大人民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都是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在贵州这种边远和极其落后的省份，各族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更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地方土目、

地主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对象。由于同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体，共同的命运造就了共同的理想：推翻封建统治，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共同的理想使人们明白了共同的目标：推翻清朝，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剥削阶级。在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之下，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和周边各民族起义队伍，在与清廷官军作斗争的过程中，互通情报、互相支援，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使黔西北苗族起义运动能够延续十多年之久。

以陶新春为首的黔西北苗族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却印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发展规律。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族人民大起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次起义涉及云贵川三省的数十个厅州县，这些厅州县官府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所到之处的剥削阶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基础。

在清朝统治的社会里，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阶层之间关系极其紧张，在各种生存利益的残酷竞争中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发展并演变成民族大起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执政当局解决社会矛盾时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社会治理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任务，治理必须从细小的事情做起，把一个一个的问题解决好。只有把人民群众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认真地加以解决，不留遗存，社会才会风清气正，平安和谐。

本人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工作，曾出版多部夜郎文化研究专著，深受国内外专家的青睐。这次推出的《烽火韭菜坪》，费尽了两年多的心血，足迹遍及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的数十个县，查阅的资料有数百万字之多，走访人士数百人，记录的文字资料有五十余万字。

通晓历史，以史为鉴，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未来需要我们倍加努力。我们要从历史的教训中认真思考，不做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不干违背人民愿望的事；做与时俱进的模范，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模范，以人为本，开拓创新，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

陈绍举

2016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第一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时的国内大势 …… 1

第一节　康乾盛世的衰微 …… 1

第二节　贵州昙花一现 …… 7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 15

第四节　贵州遍地烽烟起 …… 21

第二章　韭菜坪上燃烽火 …… 28

第一节　韭菜坪之灵 …… 28

第二节　苗族中的娇子陶新春 …… 34

第三节　起义前的宣传发动 …… 41

第四节　韭菜坪上燃烽火 …… 47

第五节　激战七星关 …… 52

第六节　争夺毕节城 …… 56

第三章　建立根据地 …… 59

第一节　涌向猪拱箐 …… 59

第二节　猪拱箐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 66

第三节　海马姑根据地建设 …… 73

第四节　红岩尖山根据地建设 …… 76

第五节　凤顶山根据地建设 …… 78

第六节　骨董山根据地建设 …… 79

第四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向川南和滇东北推进 …… 81
第一节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向川南拓展 …… 81
第二节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战斗在滇东北 …… 83
第五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与太平军的战斗友谊 …… 88
第一节　太平军进入贵州 …… 88
第二节　太平军在乌蒙山区的足迹 …… 94
第三节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与太平军合围毕节城…… 101
第四节　太平军授衔陶元帅…… 107
第五节　太平军向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传经送宝…… 113
第六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与友军的关系…… 120
第一节　营救水城何仙姑苗族起义军…… 120
第二节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与岩大五义军的情谊…… 127
第七章　多省官军围剿黔西北苗族起义军…… 134
第一节　清廷下令进剿猪拱箐…… 134
第二节　官军开向猪拱箐…… 140
第三节　官军在镇雄州清剿黔西北苗族起义军…… 147
第四节　官军攻破红岩尖山根据地…… 154
第八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的终结…… 161
第一节　猪拱箐根据地保卫战…… 161
第二节　海马姑根据地保卫战…… 167
第三节　官军清剿黔西北苗族起义军余部…… 171
第四节　黔西北苗族起义军的终结…… 176
第五节　镇压黔西北苗族起义后的岑毓英…… 181
后　记…… 184

第一章　黔西北苗族起义时的国内大势

清咸丰十年(1860)黔西北苗族领袖陶新春发动数万苗族群众在威宁州赫章汛韭菜坪举行起义,持续十多年,活动范围涉及贵州、云南、四川三省数十个厅州县,给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这次起义,与国内阶级矛盾相联系,是国内阶级压迫发展的结果,是封建社会官场腐化堕落的必然结果。这次起义,与鸦片战争相联系,是鸦片战争后全国人民反对列强入侵,反对支付战争赔款,反对卖国求荣在黔西北地区的有力表现。这次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相联系,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呼应与支持。研究这次起义的原因、过程、时间、地点、起义民众的构成、起义打出的口号等,有利于我们认识黔西北地区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现状、经济状况、阶级矛盾等问题。

第一节　康乾盛世的衰微

每一个封建王朝取得政权之初,统治集团的骨干们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制定的政策基本合民心顺民意;各级官员基本上保持清正廉洁,一般不会搜刮民脂民膏;比较注意照顾民众情绪,民生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开始滋生了享乐主义。要享乐,就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手里要有足够的金钱。没有金钱,什么享乐都不可能,有了钱,一切骄奢淫逸就能办到了。二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没有时间,即使有钱,个人的享受都会被拖延,有了时间,再加上手里有足够的钱,享乐什么,什么时候享乐都可以实现。为了弄钱,他们必不可少地搜刮民脂民膏,从人民群众身上掠夺财富,以加紧资金的聚集。为了享乐,他们一定是不理朝政,庸官、昏官、懒官一天比一天增多。由于统治阶级享乐主义的出现,地方豪绅阶层卷土重来,他们将从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用一部分输送给统治阶级,以更进一步满足统治阶级的享乐,而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行为一定会采取纵容的态度,豪绅也会依仗封建统治势力进一步压榨人民。

封建王朝的享乐主义一出现,社会就开始混乱了。民众对他们有意见,封建统治集团又采取压制民众的办法,这样就形成了两大对抗阵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贪婪是无底深坑,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榨取同样会有增无减,地方土豪劣绅会积极地参与到榨取人民群众的行动中,人民群众只有组织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就出现了农民起义。对待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是镇压的办法,而人民越受到镇压就越反抗,由点到面,最后形成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封建王朝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垮台是统治集团享乐主义发展的结果,

新的封建王朝的兴起是前一个封建王朝衰退的结果。

清朝代替明朝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倭寇的扰华，而是爆发了农民起义。明朝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者的享乐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导致了官场的极度腐化，大小官员不理朝政，社会一片混乱，加之土地兼并严重，政府加派田赋，使得农民生活变得更加痛苦不堪。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据点，经过30多年，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八旗制度，初步奠定了国家的形态。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几年后，后金占领了辽东七十余城。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加强对明朝的攻势。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定都北京，从此清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并迅速统一了中国。

清朝建都北京后，历经顺治（1644至1661）、康熙（1662至1722）、雍正（1723至1735）、乾隆（1736至1795）、嘉庆（1796至1820）、道光（1821至1850）、咸丰（1851至1861）、同治（1862至1874）、光绪（1875至1908）、宣统（1909至1911）十朝，267年历史，其中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最为繁荣，史称“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清朝之初，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注意学习汉族的先进技术，同时保持了本民族的骑马射箭技术。皇太极的妻子孝庄文皇后，精心扶持儿子顺治、孙子康熙两个小幼主。她曾教导年幼的康熙说：“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到乾隆继位之初，从皇子皇孙到八旗子弟基本是励精图治的，满洲贵族们注重团结汉族人士，实行满汉贵族联合统治。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发展高峰，起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长达115年时间，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疆域辽阔，因而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康熙，爱新觉罗·玄烨，即清圣祖（1654年5月4日至1722年12月20日），清世祖福临第三子，清朝第四位皇帝，年号康熙，在位61年，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在位期间为国家作了许多工作，开创了清朝全新的盛世局面，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

一是改革了最高管理体制。清朝初期，中央政权机构还保留明朝议政王大臣会议体制，凡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大事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康熙帝亲政后，在宫内设置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室工作。翰林院学士除陪同皇帝读书写字外，实际上参与了决策，替皇帝草拟文件。康熙帝把中央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相互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从此，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利受到削弱。这种改革，适应了清朝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是平定了“三藩之乱”。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藩之乱”就是清朝初期由这三个藩王发起的反清事件。清朝入关后为了对付李自成农民军和明朝残余的反抗，明朝的降官是可以借助的力量，三藩的头目是明朝遗留的官员被清朝受

用。被清朝授用的三藩头目，开始表现是好的，但二十年后，驻云南的吴三桂、驻广东的尚可喜、驻福建的耿精忠等藩王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与清廷分庭抗礼。其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不仅在经济上是清朝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稳定。清康熙十二年(1673)春，康熙作出了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于这年的11月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清廷。吴三桂率军由云南、贵州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占据四川，并在湖南沿江布置防御工事，四川的清朝地方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都有藩王或将领响应。但是，由于清朝起源于东北，在北方的势力较大，吴三桂不敢再向北发展。康熙帝抓住机会调整战略，安排重兵首先打击吴三桂，对其他的反叛者却实行招抚，尚可喜、耿精忠接受了招抚。这样，清廷成功地通过分化力量孤立吴三桂。在军事上，康熙帝以湖南为进攻重点，同时充分信任汉将，这样就鼓舞了朝廷军队的士气。在尚可喜、耿精忠归顺清廷之后，吴三桂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将领。其实这时的吴三桂已到了穷途末路。吴三桂积郁而死后，将所谓的"帝位"传给孙子吴世璠。清康熙二十年(1681)冬，清军进入云贵两省，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三藩平定之后，国内政治形势稳定。

三是加强了边疆稳定工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清康熙帝于二十二年(1683)收复了被郑氏政权统治的台湾，后来打败了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军队，又于二十八年(1689)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立了中国与沙俄在东北的疆界，奠定了中国版图。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并创立了多伦会盟，巩固了蒙古，使蒙古成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康熙帝协助达赖七世入西藏，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经济方面，康熙帝鼓励开荒，减少农民赋税，实行"永不加赋"，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设置驻藏大臣，管辖西藏事务；废除土司，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至1735年10月8日)，康熙的第四子，清朝第五位皇帝。康熙的太子被废后，胤禛继承皇位，改为雍正，在位13年。雍正在位时承前启后，开拓进取，励精图治，推进改革，整顿吏治，清理钱粮，扩大垦田，以银养廉，革除旗主，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并设立了军机处，安定西藏，推进"改土归流"，设置五世班禅等等，促进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政局稳定，边疆巩固，增强了统一。雍正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

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至1799年2月7日)，雍正帝第四子，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在位60年，退位后当了3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帝时期，经济稳定发展，国家实力继续增强，社会继续稳定；开展了反对分裂的斗争，平定了多次叛乱，促使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满蒙、满回联系得到加强，稳固了清朝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大清帝国达到了全盛时期，也是封建经济的全盛时期。乾隆继承前二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

康雍乾时期的繁荣是清朝三代皇帝前后一贯努力的结果，是三朝政策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结果。从严整吏治这方面来看，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因之一。清朝入关后，以

明朝亡国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气。“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实行这一政策，政治形势好转，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圣祖康熙以“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如于成龙、鄂尔泰都是当时著名的清官。世宗雍正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时期清朝已进入鼎盛时期，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乾隆以贪污罪处决了其内弟，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高恒，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吏治改观，用“源清流洁”与“政通人和”来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从雍正时期开始，清朝还在西南地区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流官，“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全部完成，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康雍乾三朝皇帝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达到家给人足。虽然清朝统治者起源于渔猎民族，其重视农业的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汉族王朝，甚至某些方面比汉族王朝还做得好。他们以农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康熙说过的一句话：“农事实为过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清康熙元年（1662）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起科年限一再放宽，用以鼓励垦荒的积极性。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据清朝官方统计：清康熙六十年（1721）底，全国土地已达0.49亿公顷，到雍正时增长到0.6亿公顷，乾隆末已超过0.67亿公顷。因此史称“盖自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此外，又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实施治黄，历时30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

康雍乾三帝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民众生活状况，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这三朝皇帝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大众要求的措施，国库进一步充盈。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清雍正五年（1727）已达到5000万两，到乾隆时代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在财政快速增长的同时，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诸如反加派、反克扣、反勒索等，为农民减租减赋，实行减免、赈济等政策，有力地保护了农民的合法利益，使百姓得到实惠。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清康熙元年（1662）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7亿两。又自清康熙五十年（1711）起，三年内总共减免全国新征、旧欠税赋共银3206万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折合银子1.2亿两。人们有了稳定的生活环境，负担减轻了，人口迅速增长，到清康熙六十

一年(1722)人口数量突破1亿,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突破3亿。

康雍乾三帝坚持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反对分裂,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早在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政策,将东北及华北广大地区纳入清朝统治之下。入关后,清朝统治疆域与统治集团的民族观念发生了巨变。清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皇帝提出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两千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大一统的思想触动了某些部族的利益,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带头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朝军队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雍正时三战噶尔丹。乾隆时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取得胜利。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北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经过七十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康雍乾盛世,艺术达到了顶峰。最典型的是坐落于今北京市海淀区的圆明园,是清朝时期的大型皇家园林,占地约347公顷,由圆明园及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统称为"圆明三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其规模宏伟,运用了各种造园技巧,融会了各式园林风格,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圆明园中最著名的是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又称为圆明园兽首、圆明园红铜兽首等。这些青铜生肖雕像制作精湛,雕刻精细,是清朝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安放在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前的扇形水池喷水台南北两岸十二石台上。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则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壮观。

圆明园的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其中不少景观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艺术精华。乾隆皇帝曾经六次南巡江浙等地,每到一地,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画,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园林风景有直接摹本的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十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

圆明三园共有一百余处景观,即通常所说的一百景。殿堂、楼阁、亭台、轩榭、馆斋、廊庑等各种景观建筑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1万平方米。园内建筑物既吸取了历代宫殿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型、群体组合诸多方面突破了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风格,如字轩、眉月轩、田字殿,还有扇面形、弓面形、圆镜形、工字形、山字形、十字形、方胜形、书卷形等等。加之圆明园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套,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

康雍乾三朝大一统的思想开疆扩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超越汉唐。清朝的中国版图,为现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康乾盛世以恢宏的气势,一系列重大成就,显示出当时历史与文化的辉煌。与同时代的

周边国家相比，清朝实居东方文明之首，也是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在入关后，巩固王朝，建设盛世的同时，消极负面的东西也随之而来。

一是大兴文字狱。清朝建立后，对汉族大肆进行压迫，以大军向南方挺进。汉族中读书明理的人，民族意识极强的人，不甘于压迫的人，向南方退却，加上当时南方为富庶之地，经济实力雄厚，抗清运动即以南方为中心。文人们对清朝贵族的统治开始是以武力为抗拒方式。由于清朝贵族的统治日益巩固，文人们的抗拒转为地下各种社会团体之中。此时，各种社会团体遍布于东南各地，这些社会团体大多是由文人们自由组织而成，有的社会团体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不少有着极强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的文人，都潜藏在社团里活动。

文人们坚强的民族意识，激烈的民族情绪，引起了清朝统治阶层的高度戒备，因而大兴文字狱。当时，凡是著作，无论文史，小到考试题目，清朝统治者认为有讥讽朝廷或者反对清朝情绪的，必大兴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顺治皇帝统治时期，兴文字狱7次；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兴文字狱12次；雍正皇帝统治时期，兴文字狱17次；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兴文字狱130次。乾隆年间，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其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之句被告发。清廷认为，这是影射满族人以异族夺取朱明皇位，犯大逆罪，当时诗人已死，清廷下令剖棺锉尸。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著《字贯》，涉嫌删改《康熙字典》被人告发，江西巡抚海成上奏朝廷，请求革去王锡侯的举人。乾隆皇帝阅览《字贯》后，认为大逆不道，判斩决。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了社会恐怖，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是奢靡之风抬头。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到乾隆继位时已达到极盛。乾隆在位的60年间，清朝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在各项事业不断推进的同时，奢靡之风也越来越严重。乾隆好大喜功，他六次下江南，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巡游，以游山玩水为目的。每次出游，不仅消耗资金巨大，而且所到之处还严重扰民。为了满足奢靡所需，在江南造了很多园林，供自己和皇宫人员休闲所用。因此，人们认为乾隆不如康熙、雍正那样廉洁。

三是贪腐之风。到了乾隆晚年，许多高官开始追求享受，贪污腐化开始泛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贪污灾款和监生捐款案，涉及贪污的官吏近200人。云贵总督李侍尧，借故收买贡品大事贪污。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清查王亶望集团贪污案时，监守自盗，把查获的许多珍宝玉器通过调包的方式据为己有。更为严重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和绅，一向为乾隆帝所信任，经常参与清查贪腐大案的工作，自己却是一个头号贪污犯。和珅被揭露出来以后，其财产之巨，数可敌国。浙闽总督伍拉纳贪污的经济，折合银子40万两。乾隆皇帝虽然也时时注意反腐，但这时的贪污腐化之风，木已成舟，不可逆转了。

世风不正，首先是官风不正。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编修洪亮吉在嘉庆初年揭露说：“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洪北江全集》中士大夫不顾廉耻到什么程度？有尚书侍郎为

求升官给宰相下跪的，有七八十岁的大学士甘心拜倒在年轻权贵面前求做门生的，有高官与宰相家的奴仆称兄道弟的。太学里一般被看成是清水衙门，但为了当上太学里的主管，有半夜时更到宰相家里送礼求情的，有跪在主管面前以求当太学老师的。翰林院大考，国家据此提拔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考取，有人事先走通军机大臣的关系，透露得到考题；有人贿赂监考，将考卷递出考场，请人答好后，再传进考场。

地方的不正之风更为严重。清朝选举人才的大权本来操控在朝廷手里，但到了乾隆时代，地方总督、巡抚渐渐地通过各种手段，将选人大权揽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想当州官、县官的人，必须贿赂总督、巡抚这些省级高官。每有一个官职缺位，到总督、巡抚家里贿赂的人不绝于路，贿赂的银两一人比一人多。贪污腐化的风气，充满了官场，即使原来很好的人也变坏了。有些正直的读书人，干脆到书院里当老师，以远离官场。

洪亮吉说，他小的时候看到，过去有人当了州官、县官，乡亲们都前去相聚，嘘寒问暖，官员与乡亲们平等相爱，相互关心。到了他青年时，看到有人当了州官、县官，乡亲们前去是帮忙算经济账，看哪一个官位花多少银两能够买到，需要多少银两应酬，上任后一年收入多少，几年能够还上贿赂所用的钱，最后能够赚到多少银两。至于民生吏治之事，则无人去关心。最不善于受贿的县官，当了几年官员，就可温饱几代人。所以古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地方的小吏，无望当大官，成天想着生财之道。这些小吏，都是地方上的恶霸，一旦进入官场，就被称作"公人""官人"，原来穷嗖嗖的，此时变得相当阔气，一家十几口人，皆鲜衣美食，谁也惹不起他们。由于上级官员要依靠这些小吏办事，也得迁就这些地头蛇，因而这些小吏犯事，一般无大碍。这些小吏，数目相当多，大县有上千人，小县也有几百人，平均十家百姓要供养一个。

四是物价飞涨。在康雍乾时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土地增长就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后来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就不及清朝初期的面积多。人多了，资源消耗量就大，而土地所产出的物质又是有限的，于是物价就高涨起来。到了乾隆时代，每一升米的价格是50年前的五六倍，布匹的价格是50年前的三四倍。收入不增，支出猛增，老百姓向着贫困方面发展。

由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过程中大肆压迫汉族群众，大兴文字狱，加上长达数百年的统治过程中积淀的社会弊端，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反抗，当时机成熟，就会变成强大的社会洪流，越发不可阻挡。

第二节　贵州昙花一现

清朝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就不断地加强对全国特别是西南、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奖励垦殖、发展农业生产、倡导文教的政策，使各项事业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在击败南明抗清政权和吴三桂叛乱之后，对贵州进行了各项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贵州在清朝前期处于发展之中。

一、清剿反清势力

清朝定都北京，标志着清朝的建立。清朝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明朝残余势力还在同清军抗争；另一方面，农民起义军在各地开展抗清斗争。在北方，李自成牺牲后，余部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在南方，明王朝的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并建立几个南方小政权，即南明小政权。清顺治三年（1646）冬，明朝驻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与旧臣吕大器等人公推永明王朱由榔在西梧州监国。不久，朱由榔移居肇庆称帝，建立永历政权（1647—1661）。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于清顺治四年（1647）在与清军作战中箭身亡，余部孙可望、李定国退入贵州、云南，联合南明小政权共同抗清。

清顺治四年（1647），孙可望、李定国率大西军余部由四川向贵州、云南挺进。不久，这两个省的大部分地区由大西军占领。大西军到贵州、云南后，一改过去的反明主张，联合明朝残余势力继续开展抗清斗争。二月，大西军派人将永历帝朱由榔从广西濑湍接到贵州南龙所，改南龙所为安龙府。朱由榔封孙可望为秦王，并给“诛斩封奏，先行后奏”的特权。五月，大西军兵分三路，北路由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率步骑六万进攻四川；东路由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率步骑十万和少数民族的象队进攻湖广；中路由孙可望为主帅，出兵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策应两军。北路军开始节节胜利，屡败清军，后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警惕，转胜为败。刘文秀退回贵州，孙可望将其罢职，拆散其部属，削弱了农民军的战斗力，引起农民军各部官兵的不满，导致人心涣散，内部不和。东路军连续攻下湖南沅州、武岗、宝庆、东安，接着攻取广西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等重镇。八月以后，东路军又攻下湖南永州、衡州、长沙、常德、岳州等县城，还包围了江西吉安，在7个月内攻克了16府、2州，辟地3000余里。

由于清军屡败，朝廷准备放弃湘、赣时，大西军内部矛盾显现，首领之间相互嫉妒，互相残杀。清顺治十年（1653）八月，中路军孙可望率14万兵力进攻东路军李定国部，东路军李定国败北，逃到贵阳。十月，孙可望率数十骑直逃湖南长沙，投靠洪承畴，向清军“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清廷特封其义王。后来，康熙帝在狩猎时以错射为名，将孙可望杀死。

清顺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十五日，顺治帝下令，派军队分别从湖南、四川、广西向贵州挺进，定期贵阳会师。清军在进军贵阳时，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严禁烧杀抢掠，规定若发生烧杀抢掠，对当事者从严论处，以示惩戒，同时，加强纪律整顿，提高军队战斗力。对清军未进入的地方，采取发布告示等措施，加强宣传，使民众知晓清朝政策，减少民众的反抗。清廷利用大西军自相残杀的有利形势，对负隅顽抗的大西军余部进行清剿。清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朝廷正式任命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此后，大西军余部已全部退出贵州，继续在云南边境活动。永历帝朱由榔从滇西逃往缅甸，清康熙元年（1662）三月被清军抓获，后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金蝉寺。六月，大西军东路军首领李定国在云南景洪含恨吐血而死。至此，贵州主要抗清势力基本覆灭，清朝已初步稳定云贵的形势。

二、改革地方行政体制

清朝在贵州进行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革

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进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分子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牂州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贵州“改土归流”工作从明朝就开始了，先对思州、思南两个田氏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后又对播州杨氏土司、水东宋氏土司进行“改土归流”。至清初，贵州的大土司就只剩下水西安氏土司。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与贵州地方土司的矛盾主要是和水西安氏土司的矛盾。清朝在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是针对水西安氏土司的。在清廷进入贵州之初，朝廷暂时保留土司体制，这是一种缓兵之计，到了时机成熟，进行“改土归流”就成了必然。

水西安氏土司安坤是安承宗之子，最初是接受南明永历王的封赐而承袭宣慰使的。清顺治十五年(1658)，在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时，清朝官员洪承畴派人招抚安坤，安坤派员引导清军中路军进军镇远、平越而至贵阳；引导清军西路军吴三桂取开州，降修文、广顺，使清军顺利地进入云南。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正式册封安坤为水西宣慰使司宣慰使，赐袍帽靴袜、彩缎、货币等物，加都督佥事，并赐金印，准其世袭。之后，安坤多次遣送反清明将。虽然安坤为清廷做了很多好事，但清廷主要是利用安坤，以打通贵州进入云南的障碍，对他不是十分放心，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措施。就在安坤积极地帮助清廷缉拿、擒送反清明将时，贵州境内连续发生了黎平土官联合孙可望残余反清，普安土目与安南卫屯军结仇引发劫杀导致民众逃窜事件，黎平县归公寨苗民事件，以及部分土官反清事件等，说明了明朝残余和农民起义军余部，在被清廷击败之后，还想利用土官势力进行反清活动。这时，安坤对清廷的态度还在保持忠诚，并没有涉及反清活动。然而，安坤对于清廷是否让他永久担任宣慰使土司之职，仍然持怀疑态度。

坐镇云贵的吴三桂利用清廷对安坤保持的戒心，趁大定总兵刘之福对安坤诛求未遂，污蔑安坤谋反，向清廷奏疏，说安坤蓄谋已久，乌撒土司安重圣反侧叵测，请求给先发制人的打击，铲除要隘梗阻，以伸国威。清顺治十七年(1660)十月，清廷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奉阴违，心怀叵测，悉心筹划，相机歼剿。吴三桂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清廷力量铲平当时贵州最大的土司安坤，为自己割据祖国西南地区扫清障碍。清康熙三年(1664)正月，明朝余将常金印与皮熊在水西密谋策划反清，吴三桂仍然污称安坤与之勾结，决定进剿水西。事件发生后，总督杨梦勋立即上书清廷，强调水西地区地理位置之重要，与吴三桂合作清剿，以废止水西土司，改设流官，把权力集中在清廷手中。于是，清廷下令吴三桂率领云南、贵州各镇守兵讨伐安坤。

在吴三桂的威逼下，清康熙三年(1664)二月，安坤率众数万，联合明朝余将皮熊，推其叔